

台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

羅宗濤·張雙英◎著

1988-1996

文學史類·文

新詩類·散文類

論評書評·電影評論
作家評論·書評

台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

羅宗壽・張雙英 合著

臺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

著 者：羅宗壽、張雙英
發 行 人：許銓輝
責 任 編 輯：萬卷樓叢書編輯部
出 版 者：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67 號 14 樓之 1
電話(02)23216565 · 23952992
FAX(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 站 網 址：<http://www.books.com.tw/>
E -mail：wanjuan@tpts5.seed.net.tw
經 銷 代 球：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0 巷 30 弄 25 號
電話(02)27999490
FAX(02)27995284
承 印 廠 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定 價：600 元
出 版 日 期：民國 88 年 5 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739-209-1

感謝辭

這本兼具資料與論評的書，係結合多人的努力與多方的協助，經過一年半的煎熬才完成的，因此我們必須表達由衷的謝意，感謝陳全得、簡義明、黃郁博、蔡淑華、陳佳姪與曾秀萍等年青學者們從頭至尾的投入，也感謝各地文化中心、出版社、書局的提供資料與目錄，更感謝國科會的經費支持與萬卷樓圖書公司慨允出版這麼冷僻的學術性著作。當然，我們更願意這一辛勞的結晶，可為我們當代的文學研究同仁稍盡棉薄。

羅宗濤・張雙英 于 88.3.

目 次

緒論 1

上編 各類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

- 第一章 小說類 9
- 第二章 新詩類 69
- 第三章 散文類 119
- 第四章 戲劇類 139
- 第五章 其他文類 149
- 第六章 文學批評（含理論）與文學史類 159
- 第七章 作家及其集團研究類 201

下編 各年文學研究的特色

- 第八章 1988 年的特色 215
- 第九章 1989 年的特色 225
- 第十章 1990 年的特色 235
- 第十一章 1991 年的特色 247
- 第十二章 1992 年的特色 265
- 第十三章 1993 年的特色 273
- 第十四章 1994 年的特色 291
- 第十五章 1995 年的特色 305
- 第十六章 1996 年的特色 325

結論 345

緒論

在人類的發展歷史上，由於有地方的碰觸和血緣的歧異，因此產生了許多不同的種族與國家，更發展出許多各自成為完整系統的文明與文化傳承。但是，當我們在綜觀這一切現象之後，似乎可以立即從他們之中發現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在各個種族與國家中，都會有一股足以表現出他們的人性特色、理想圖繪以及種種實際生活樣態的「文學」脈絡。這一個情況顯然指出了「文學」的一大特質——它是沒有時間與空間界限的。

不過，接下來的問題就更直接了，那就是「文學是什麼呢？」這一問題，古今中外的各家說法並不一致。但若說它是一種「用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和表現人們思想與感情的語言藝術」當頗為中肯。¹換言之，「文學」一方面具有「自主性」，因為它允許「作家」自由地想抒寫什麼就抒寫什麼，想如何表達就如何表達。於是，我們說它擁有原創性的特質和獨立的生命當是有根據的。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由於「它」所抒寫或表達的，有極大部分是在「它」出現之前早就存在的事物——無論是事實或虛構，所以嚴格說來，它仍具有無法完全擺脫被所要抒寫或表達的對象拘限住的宿命。

由於這一潛在的矛盾性不但難以有效的解決，同時，即使解決了也沒有深刻的意義，所以乃使不少有心人將研究的中心課題轉到「文學應該是什麼？」或「文學應該做什麼？」等比較具有實用性的爭論上。也就是說，

¹ 請參考黃世瑜《文學理論新編》，頁11～263。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西元1986年（民國75年）。

人們對「文學」的關注點已轉移到「文學」對「人」、「社會」甚至「文化」有何影響上了。

這種轉變，顯然是以「時間」縱軸為基而呈現出來的。因此，我們在此不妨也稍微停留一下，將台灣地區將近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系（所）在課程的開設上稍做介紹，基本上，早期大學中的中國文學系（所）所開的課程可謂包羅甚廣，幾乎把傳統的經、史、子、集等四部學問都涵蓋在內。然而，也正因此之故，而發生了跟哲學系、歷史系，甚至於政治系、圖書館學系、考古人類學系、語言學系……等所開設的課程以及研究專題相互重疊的現象。所以我們其實可以說，在這段期間中，所謂的「文學」仍泛指「一切的學問」。

這種情況，一直要到二十年前，才在時代潮流的強力衝擊之下逐漸改變；中文系（所）的「文學」課程，也是到了此時才成為核心課程。不過，即使如此，在這種比較新的、符合世界潮流的課程設計與安排中，卻又產生了「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兩者間誰輕誰重的問題。而這一個問題之所以會在當時發生，其背後實會有下列幾個很難避免的因素：

一、五十年前發生了國府與共黨分別在兩岸主政的對峙局面，而台灣在國府極力爭取代表中華民族正統的政策下，乃全力提倡中華傳統文化；因而，毫無疑問的，「古典文學」課程的開設、和以它為對象的研究，當然比較能夠具有實用的意涵，並受到肯定。

二、自清末民初以來，「現代文學」的傑出作家與作品固然不能算少，但在當時一切均由政治掛帥的時空之中，想在台灣找到這方面的資料並不容易，因此，開設「現代文學」課程，或以它為研究專題，不但困難重重，而且甚至常會發生與政治思想上的禁忌衝突的情形。當然，「現代文學」便較乏人問津了。

三、在專業的學術領域上，以「現代文學」為研究範疇的學者原來就不多，而其中具有能在大學任教資格的人更少，因此，大學裡的中文系

(所)，在早期的課程安排上，「現代文學」當然遠比「古典文學」少得多了。

但上述這種狀況，到了七〇年代末期，即因戒嚴令的解除，和威權體制隨之成為過眼雲煙而有了改變。尤其，更因為世界村的概念風行，國際化的潮流一波波湧入，外國的現代化資訊、方法和理論觀念不斷地在衝擊著這個風氣頗為保守的寶島，而終於造成了這裡的人們自我意識高漲和追求民主制度的風氣，於是本土化與國際化便成了這塊土地上大多數人認為未來應該發展的兩個主要平行線。在這種體認之下，中文系(所)遂與「不食人間煙火」逐漸掛勾，甚至還被若干人批評為「與社會脈動脫節」。這一個全國性的走向，終於促使中文系(所)有了明顯的改變，而開始積極的參與社會的活動，並逐漸增開有關「現代文學」的課程。事實上，除了上述的原因外，中文系(所)能夠在當時這麼做，實在是因為還有下面幾個漸漸成熟的條件來配合的：

- 一、「現代文學」在資料的取得上比以前容易得多。
- 二、其價值不但已無人懷疑和輕忽，相反的，已倍受各界的肯定與鼓勵。

三、有關這方面的師資已不成問題。

總而言之，「現代文學」已取得了應有的地位；而我們綜觀其根本的原因，乃是已有絕大多數的人認清了「文學」是具有深遠影響力的一不但是在社會上，而且也在政治上或文化上。

「文學」的影響力到底如何呢？自理論層次上而言，「文學」一方面不但提供管道讓作者抒發情感、思想，以及描繪想像等，而且可使作者利用它來與人聯絡、溝通，甚至因而獲得名聲、地位等實際的利益。在另一方面，「文學」也能使得讀者有機會涵泳性情、增廣見聞，以及使歷史的

記錄和意蘊更為真實和深刻。²

不過，理論上固然如此，但綜觀中外歷史，無論是古或今，「文學」所擁有的這些功能似乎從來都沒有完全實現過，尤其在對「大社會」上。其原因當然非常複雜，但「受到實際環境的影響」則無疑的佔有最根本的位置。我們其實甚至可以說，「文學」受「社會」的影響要遠比它影響社會大得多了。

「文學」和「人」與「社會」的關係既然這麼密切，於是筆者乃想以中國文學系同仁的身份，藉實際的例子來了解在我們現代中「文學和社會」的關係究竟如何？因此便選擇自西元1988年（民國77年）1月，到西元1996年（民國85年）12月的時段中，在台灣地區有關現代文學研究的情況和趨勢做為研究的對象。而所以會選擇這一題目，基本的理由約可歸納出下列幾點：

一、台灣做為華人匯萃的地區，在大陸推動堪稱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之文化大革命後，它顯然已成為中華文化最繁實的堡壘。除此之外，它又曾受到日本統治，甚至推行過棄漢擁日的皇民文化政策，而形成了一種將日本文化融合入台灣本土文化的交雜不清的現象。因此，這三種「文化」融合之後，到底它所呈現的結果是怎樣的一種形貌和特質？這一現象當是值得我們關切的課題。

二、西元1987年（民國76年）8月，台灣解除了戒嚴法。這一大事，對於被嚴密禁錮達四十年之久的台灣，在政治走向和社會風氣的影響上已顯然易見，但到底它對「文學」的創作和研究是否也有影響呢？而若答案為有，則影響有多大？毫無疑問的，這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三、「文學」既是與「人」和「社會」密切相關的，當然與上列兩項

² 請參考張雙英《中國歷代詩歌大要與作品選析》，上冊，頁73～106。

新文豐公司，西元1996年（民國85年）。

跟政治有關的事件也會產生關聯。我們可引用兩位在我們台灣甚獲肯定的學者和專家的觀點來做為注腳。在西元1997年（民國86年）12月下旬，聯合報社舉辦了《台灣現代小說史研討會》，並請齊邦媛教授和葉石濤先生發表引言，齊教授在其〈霧漸漸散的時候〉一文中說：

一九八八年政治解嚴，十年來，言論自由，百無禁忌。

葉石濤先生則在其〈台灣文學的多種族課題〉說：

八〇年代末期的解嚴帶來給現代台灣文學一大衝擊，台灣社會逐漸形成嶄新的民主自由社會，以前的異端思想不再是禁忌，台灣人擁有多元化，自我發揮的廣大空間。³

事實上，自西元1987年（民國76年）8月解嚴以來，台灣地區已趨向多元化，前述兩位文壇耆宿所說的「禁忌解除」和「言論、思想自由」，當然是對這八、九年來台灣社會上各種聲音的喧嘩擾攘現象在深刻體會後所做的貼切描述。做為與人們心靈緊密相連，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甚至還被譽為「比歷史更真實」，「比表層更深入」的「文學」，在這些年中，不但產生了許多比以往描寫更深刻，寫實性更強，以及想像力更豐富，氣勢更磅礴的作品，連大陸地區自五四以來的傑出作家之作品也可以自由進來了。但是，令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期間中，台灣地區有關「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論述與研究也逐漸增多，而且大陸地區有關現代、當代文學的研究也蜂擁而入，這一情況使得這種趨勢不但可與素來被學院所重視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相比美，而且甚至獲得了更多社會人士和政府部門的呼應與重視。有人因此甚而說，現代文學，尤其是台灣文學

³ 兩位的引文，皆請見《聯合報》，86.12.24，副刊版。

在台灣地區已成為文學研究領域中的顯學了。

不過，當我們細讀這些年來有關的這一領域中的研究與論述時，雖十分佩服它們的研究者所擁有的熱忱、學力與抱負，但仍難掩有一絲不足的感覺。因為，它們大都屬於有關某一作家、作品和主題等專題的深入見解。換言之，我們尚未發現對這一領域有「全面性」的考察與研究，以致常覺得有見樹而未見林的遺憾。而這一個全面性不足的影響，其實是頗為深廣的，最明顯的後果至少有下列三種：

一、因無法真正全盤掌握、並了解這些研究的實際情況，所以發生重複前人研究的情形並不少，而導致了學者們浪費不少功夫和時間的結果。

二、因缺少全面性的觀點，以致於無法抓住這一研究的趨勢，而難以切入關鍵點，因此，具有屬於開創性、並突破這類研究的共同瓶頸者並不多。

三、正因缺少這類的研究，我們也時常看到一個不必有的嚴重缺失，那就是有若干研究者，雖然了解學術性的研究每每會因切入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研究結論，但卻因與別人收集的資料有差別，也忽略了別人曾提出過的論證，因而乃與別人產生激烈的爭執，甚至於不必要的誤解。因此，如果能從嚴謹的學術觀點出發，而兼顧「全面性」和「真實性」兩大礎石來做全面性的研究，則我們台灣地區的現代文學研究必可能會有長足的進步。

本研究即基於此，從「學術性」出發，首先，將我們台灣地區有關現代文學的「學術性研究與論述」加以儘量收集，將它們的目錄全面存真，以供學界參考。其次，希望能更進一步，以「文學社會學」的觀點，綜合性地對這些研究的特色和意義，以及其影響做全面性的析論。最後，更希望能將它們串組成一個以「九年」為時段的「現代文學批評史」，藉以勾勒出這些年來這一研究的大致趨勢。

至於要達到這些目的，則所採取的方法和步驟約有下列數項：

- 一、收集台灣地區在這段期間中有關這一範圍的博、碩士論文。
- 二、收集台灣地區各大學、學院、研究機構和出版社的學報、刊物中關於這一領域在這段期間中的學術性論文。
- 三、收集台灣地區各縣市文化中心在這段期間中所出版的有關這一領域的學術性論文。
- 四、收集台灣地區在這段期間中各種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有關這一領域的學術性論文。
- 五、收集台灣地區在這段期間中所出版的有關這一領域的學術專著。
- 六、將上列五項所收集到的資料，採取以下面兩種方式編目：
 - (一) 以文類觀念將它們分成七類，每類均依發表先後列出九年的目錄。
 - (二) 以一年為度，將七項類別的研究先依其類分開，再於各類中依其出版發表的先後編成目錄。
- 七、根據以上收集、編目的資料，做綜合性的析論；而採取的架構，除緒論與結論之外，主要分為上編與下編兩大部份。
- 八、在緒論部份，對「文學」、「現代文學」以及它們和國內近五十年來的大學裡中文系（所）的關係稍加描述，然後指出本書的寫作動機、方法與架構。
- 九、在上編的部份共有七章，即先以文類為基而共歸納出七類，然後更進一步對每一類在這九年中的研究趨勢，以「文學批評史」的觀點為基做一分析，以考察出每一類的研究趨勢。
- 十、在下編的部份則以「一年」為範圍，而把九年分為九章，在每年的總目錄後（這些目錄包含該年各文類的資料），對該年的研究情況，如：共有那些文類？各類的數量多少？其內涵有無特別的重點……等，依「文學社會學」的觀念加以綜括式的分析。
- 十一、最後在結論的部份，除依據上編七章、下編九章的研究成果，

8 台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

作一整合性的分析之外，並強調解嚴以來對台灣地區的「現代文學」研究極有貢獻的學術研討會、學位論文、學報刊物，以及出版單位等資料。

第一章 小說類

「現代小說」這個文類比起「現代散文」、「新詩」來說，不管是在名稱或是內容方面，它的爭議性都少得多。它既沒有「隨筆」、「漫談」、「小品」、「雜文」、「報導文學」、「手札」、「政論」、「譯述」、「評論」……等該不該納入「現代散文」範疇的困擾；也沒有關於「新詩」或「現代詩」這兩個名稱，何者較能代表二十世紀以來詩歌精神的論爭。「現代小說」與「古典小說」的分野，嚴格說來，只有使用「語言」的差別而已。在「五四運動」後，「現代小說」做為「現代文學」這個大家族的一員，自然也跟其他文類一樣，使用著「白話」來寫作。至於這個文類最基本的三要素：「人物」、「情節」、「環境」(或背景)卻是古同今然。只要具備了這三要素，不管是「按篇幅長短或規模大小分為大河小說、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極短篇小說；按題材分，可分為愛情婚姻小說、武俠小說、歷史小說、神魔小說、戰爭小說、政治小說、商業小說、農業小說、科幻小說；按表現方法分，可分為現實主義小說、現代派小說、新古典派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小說、錄影小說等；按照語言文字的通俗程度和讀者對象分，可分為嚴肅小說、大眾小說、流行小說等。」¹我們一概稱它為「小說」，只要它使用了「白話」來寫作，我們一概將它納入「現代小說」的範疇之中。就因為「現代小說」與「古典小說」的分野甚小，辨別容易，於是多數人就直接延用「小說」這個名稱，而不特別強調「現代」兩個字。

¹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頁8，西元1992年（民國81年）。

雖然「現代小說」與「古典小說」的主要區別是在「語言」上，但「小說」究竟是描寫「人」的藝術，當時空環境產生了變化，人所面臨的處境當然也會有所差別，因此，這項與「人」息息相關的藝術，當然也會跟著發生變化；再加上「五四」以來，西方思潮與文學的大量引進，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國的「現代文學」，而其中，尤以「新詩」和「小說」受到的影響最大。我們若以「現代小說」來觀察，很明顯的，它在敘述觀點和反映的內容等方面，事實上已經跟「古典小說」有若干差異了。

換言之，台灣的小說從日據時期以來，已發展出在形貌與精神上多彩紛陳的現象，但卻都與台灣所處的特殊政治、人文、地理……等環境因素緊密相連，特別是政府遷台以後，到解嚴之前，兩岸的政治對峙、兩地的音訊阻隔，更牽動著小說創作的走向。除此之外，台灣做為地球村的一分子，台灣的現代小說自然也與世界政治、文學、哲學等思潮或環境的變遷，脫離不了關係，而這層層關係也在在都是構成台灣小說的創作動能。一般說來，台灣的「小說」從追風（原名謝春木）創作的第一篇小說《她要往何處去—給苦惱姊妹們》（西元1992年，民國81年），開啓了台灣小說創作的第一頁後，一直到光復之前的這段時間中，因為處於日據時期，所以時空環境扭曲，現實條件嚴酷；然而，所折射出的，卻是作家們的不朽風骨，賴和、楊雲萍、楊守愚、楊逵、王詩琅、呂赫若、吳濁流、鍾理和、葉石濤……等傑出的作家，以如椽之筆，寫出了在帝國主義蹂躪下，人民的心靈反映：有哀哀無告的悲悽，有民族敗類罪行的揭露，有鄉土情懷的傾訴，也有著對封建婚姻的批判，可說聲聲扣人心弦，字字充滿血淚，深刻地展現了寫實主義的精髓，而這股精神，依然影響著此後的台灣小說。如果我們以十年為一個斷代，大致說來，在五〇年代，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隨即出現了反共小說；六〇年代，則有現代派小說及婚姻小說的大量出現；七〇年代，則是鄉土小說潮氣勢非凡；而自八〇年代至今，台灣小說已明顯走向多元化，其中尤以新女性主義、情色小說的發展最受人矚目。

綜觀台灣小說在上述數十年間的發展歷程，儘管繽紛多彩，但大致說來，除了六〇年代盛行的以瓊瑤、朱秀娟、曹又方、施叔青、李昂、蕭颯、蕭麗紅、廖輝英等為代表的愛情婚姻小說及高陽的歷史小說外，台灣小說的發展實有兩大方向：寫實主義及現代主義。這樣的發展概況，實與西方小說的發展趨勢一致：西方在「現代主義」小說大行其道的同時，寫實主義的傳統依然延續，從未斷絕。更具體地來說，西方自十九世紀末起，因有感於自商業革命、工業革命以來所產生的消費文明，固然帶給人們較為豐沛的物質享受，但在同時，機械文明、科技文明也帶給人災難：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使人深切反省，我們所面臨的世界環境，究竟是充滿愉悅的？還是充滿危機的？人與人之間是更靠近的？還是更疏離的？個人是更積極樂觀的？還是孤獨落寞的？在這樣的氛圍下，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新小說派……等一一出現，而落實在小說創作上，則是從描寫人的「異化」方面步步深入，首先在超現實主義小說中，描寫的是人陷入了夢幻與現實之間，意識時而清醒，時而朦朧的狀態；接著是存在主義小說，將世界的「異化」與荒誕，清楚地描繪出來；到了新小說派，更將人當成物，他們徹底疏離社會，對社會問題不聞不問，不理不睬，純然客觀地描寫，表達了人的意志無法改變世界，人存在的永恆荒誕性。這種「現代主義」文學，在引進台灣後，不但在主題方面深深地影響著台灣小說，其新穎的表現手法也帶給台灣小說家極大的衝擊，於是有的小說中出現了時空倒置、現實描繪與過往回憶交互進行、主觀心境與客觀環境重疊並陳……等寫作手法的展現。

台灣小說的批評與研究，在五〇至七〇年代時期，主要以文學性雜誌為媒體，其中以「《文學雜誌》（1956～1960）、《現代文學》（1960～1973）、《中外文學》（1973～）等三份文學性雜誌對於小說創作與批評的提倡功

不可沒。」²它們引進了當時正流行的西方文學批評的觀念，尤其是「新批評」，而使小說批評的焦點，轉向了正文和文類研究，擺脫了傳統的印象式批評，和過度關注的政治意識形態。然而，文學的批評與研究，是與文學創作的發展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的。台灣特殊的環境，造就了台灣小說風貌的特殊，除了有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分野之外，在八十年代以前更有著現代派小說與鄉土小說的不同發展路線，因而在西元1977年（民國66年）至西元1978年（民國67年）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這次論戰主要由於政治與文化意識形態的差異而起，包括何欣、尉天驥、陳映真、唐文標……等作家兼評論家，對於現代派小說家西化傾向，以及作品內容脫離生活，遠離現實，流於空洞虛無，而提出嚴厲批判。他們和主張「臺灣中心論者」的鄉土小說家，同樣主張寫實主義，認為文學應該回歸民族、回歸鄉土。現代派則有彭歌、余光中、尹雪曼、王文興等人撰文指控提倡鄉土文學的人是民族本位主義，是義和團思想。王文興更批判鄉土文學的文學論調犯有四項缺點：「文學必須以服務為目的」、「文學力求簡化」、「公式化」、「排他性」。³這次的論爭，在西元1978年（民國67年）1月18、19日舉行的「國軍文藝大會」後，逐漸平息。在已進入「後現代」多元社會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不禁為台灣知識份子及作家那種因夾處在壓縮的空間與扭曲的歷史之中，而形成政治與文化等意識形態的兩極對立情況，感到無奈與同情，但也深深感佩他們對文學的堅持。他們的相互激盪，豐富了我們的視野，也刺激了我們去省思「小說是什麼？」、「小說應該是什麼？」等問題。我們特別想說的是，在論爭的過程中，雖然雙方激

² 鄭明娕：《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小說批評》，台北：正中書局，頁25～26，西元1993年（民國82年）。

³ 王文興：〈鄉土文學的功與過〉，《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頁496～503，西元1981年（民國70年）。